

意識革命與文明重構

——馬爾庫塞“政治詩學”的詮釋學解讀

傅永軍

山東大學 中國詮釋學研究中心/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

【摘要】馬爾庫塞秉承社會批判傳統，期望通過理性重構解除現代發達工業社會的集權主義控制。新感性和新理性作為新意識的主要因素，規定了理性工具性使用的新方向，也因此改變了政治的方向。藝術化的技術實踐可以把目標變為現實，使控制由壓迫變為解放，其未來圖景就是非壓抑性的文明，或是幸福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馬爾庫塞熱衷於用藝術、感性來消除技術的功利性，攻擊性及剝削特徵，這決定了其晚期思想有著濃郁的烏托邦色彩。

【關鍵字】新感性；新理性；工藝合理性；政治詩學

“政治詩學”的主題

理性在現代社會中裂分為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並且工具理性單頭獨進造成理性化的自我否定，是第一代批判理論思想家共同分享的“韋伯啟示”。馬爾庫塞稱工具理性為工藝合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他對工藝合理性本性的分析與霍克海默、阿多諾對現代工具理性的分析並無差別。值得注意的是，與霍克海默、阿多諾注重工具理性宰製的社會學後果不同，馬爾庫塞更加注意工藝合理性所造成後果的政治學效應。這使得馬爾庫塞的思想表現出泛政治化傾向，也更加激進和偏執。馬爾庫塞用一種意識形態解構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決心，顯露出他追求理論的政治學效應的強烈渴望。即使他的那些哲學色彩相對濃郁的著作，我也願意把它們稱之為政治學著作。因為，在對工藝合理性進行分析時，馬爾庫塞首先看到的是，在技術合理化背後的強制性的政治統治傾向。馬爾庫塞比霍克海默等人都更加明確而堅定地指出：在發達工業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工具理性（科學技術）

已經異化為社會控制的工具，技術合理性（工藝合理性）成了統治的合理性，它正趨向於變成極權主義且嚴重侵入到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構成發達工業社會進行社會控制的深層基礎，取代傳統政治統治成為一種新的控制形式，一種具有非政治化要求的新型的意識形態。

相應于這種分析，馬爾庫塞所規劃的從現代集權主義控制下解放出來的途徑反而是非政治的，至少是非傳統政治的。馬爾庫塞所衷情的解放是一種理性解放。更確切說，是由審美完成的藝術解放。“美學形式的背後乃是美感與理性的被壓抑的和諧，是對統治邏輯組織生活的持久抗議，是對操作原則的批判。”¹藝術作品借助體現自由的美學形式，打動了“從苟延殘喘的剝削社會的強制和要求”中掙脫出來的“自然的”感性經驗，從而改變現實中支配一切的秩序。可見，馬爾庫塞所要完成的是一種文化救贖，只要完成從工具理性向歷史合理性的轉化，就可以實現理想社會的重建。

我把馬爾庫塞的這種革命與解放理論稱之為“政治詩學”，因為，這種理論透著近代以來的浪漫主義氣息，它把解放詩意化為美學對現代性的反抗。這因此也規定了馬爾庫塞“政治詩學”的主題：通過意識獲得解放。

如何通過意識獲得解放？馬爾庫塞寄希望於新意識的增長。在他看來，新意識的增長，是與在意識中認出並激發出要求自由的新潛能聯繫在一起的。自由的新潛能的喪失已成為人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存在的常態，因為物化意識使得每個人的意志自由從屬於社會的技術化結構和技術化操作的社會現實。結果，在實現了“免于匱乏的自由”同時，也導致“不斷增進的整合和公民服從”。社會在消除了個人與公眾的差別基礎上繼續使“個人成為壓抑之整體中的無理性的一部分”。因此，必須產生出新意識，用新意識對抗物化意識，才能恢復思想的批判性，在思想和現實的對峙中激發出自由的新潛能。

新意識要素的革命效能

馬爾庫塞所構劃的新意識，又稱新潛能，包括三個方面，即新感性、新想像力和新理性。其中，想像力是感性和理性的仲介，新意識中最為重要的是新感性和新理性。新感性是新理性的基礎，新理性對新感性的形成起著指導作用，二者相輔相成。“對社會的根本

¹ 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4 頁

改造，意味著把新的感性與新的理性結合起來”²。我們從探索新感性、確定理性新概念和追問技術的目的三個方面，分析馬爾庫塞對新意識的理性探索。

1·新感性（new sensibility）

馬爾庫塞的新感性觀是其後期批判理論的一個主要生長點，在新馬克思主義思潮中佔據重要地位。新感性既是社會主義政治分析的概念工具，又是向社會主義“新人”提出的道德行為規範，同時也是一個審美範疇。所以說，新感性觀是馬爾庫塞許多思想的交匯點，是理解馬爾庫塞思想的一個關鍵。

什麼是新感性？馬爾庫塞沒有明確定義，但通過分析其有關論述可以得知新感性有以下特點：

首先，新感性是一種全新的對對象的感受性，包括感覺、需要、情欲等；新感性反工具理性，具有非功利性、非操作性，反攻擊和壓迫等屬性。“新感性，表現著生命本能對攻擊性和罪惡的超升，它將在社會的範圍內，孕育出充滿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難”^{3[2](p106)}。新感性具有審美性質。它是人與自然的媒介，通過它打開人與自然的新關係——不是把自然和人僅看作是工具，而是把它們看成是有生命的主客體。新感性作為一種新的人本主義原則，指導著“社會主義新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要求無產階級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倫理特徵現在就應成為“那些為這種社會而鬥爭的人們的基本需求”。它宣導快樂、愛欲、安寧、和諧、遊藝、好美、厭爭、無疚等價值，要人們放棄攻擊、破壞、抑鬱、競爭、遲鈍、緊張、負疚等壓抑性昇華物。因此，新感性也是一種“顛覆能力”。解放了的感覺將用兩種方式否定工具理性並維持和發展其成就：“消極方式是，自我、他人和對象世界不再在對財產的攻取、競爭和保衛的情況下來經驗；積極方式是，通過對‘自然的人道佔有’，即是說通過把自然變為對人的本質（作為類存在）來說是一個環境世界（媒質）的方式，而人的本質就是自由地發展人的創造性的、美的特殊稟賦”³。

其次，新感性是一種置於價值理性指導之下的“合理的感覺能力”。從新感性的對象和內容看，它感受的是“自然中的感性的美的質”，是“自由的新的質”，它反映的是人的本真需要，是真正知識的來源。可以說沒有新感性就不能發現新潛能。

第三，新感性是“新人”和“新社會”誕生的前提。革命必須以意識革命為前提，而意識革命包含著感性革命。向自由社會的過渡，要以全新感覺為前提，以與傳統經驗及歪

² 馬爾庫塞：《審美之維》，三聯書店 1989 年版，第 119 頁

³ 馬爾庫塞：《工業社會和新左派》，商務印書館 1982 年版，第 131—132 頁

曲的感覺的決裂為前提。不進行感性革命，就把握不住真正的需要和潛能，就不會有向新社會過渡的真正動力，也不會有真正的革命。社會變化若應是質的合理性的變化的話，那麼原先知覺的結構和原初經驗本身必須合理地改變。因此，新感性是新的合理性的根源。

第四，新感性是對一種新的歷史主體——易感、善感、敏感型的感性主體的描述。馬爾庫塞的新感性概念源於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感性”概念。他在《反革命與造反》和其他許多著作中都談了感性概念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地位。他認為在《手稿》中，馬克思論證了人要成為人，作為類本質，就必須對象化，對象化由於感性的作用必然要異化。因此要達到人的解放，必須要求“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而這種解放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只有這一解放才是“私有制的揚棄”。馬爾庫塞解釋說，人作為對象化的存在物是感性存在物。人從本質上是由感性決定的，人是由對象設定的，人是被作用的、被動的存在物。但感覺不單純是被動的、接受性的；它們自己已經在進行“綜合”，它們使原始的經驗材料服從於這些綜合。而綜合不限於直觀純形式（空間和時間）的綜合，而可能的倒是還存在著別的更具體的“物質的”綜合，它們構成了體驗到的經驗的（歷史的）超越性⁴。這裏的感性，類似於康德的感性概念，人既創造、構造對象，對象又設定人，遵循的依然是主體性原則。而這種思路在馬克思那裏也存在，“通過感性，使需要和需求，使對人的既有的對象性的依賴性在人自身的本質中紮根”。正是在這裏，馬克思同黑格爾的抽象的唯心主義決裂了。表現在感性中的“激情”、“熱情”、“需要”、“需求”，決定著人的整個存在，它們是人的本質的本體論範疇。他指出，也許正是在感性（作為對象化）這個概述上，在人的本質規定這個中心問題上，馬克思完成了從德國古典哲學到革命理論的決定性轉變，因為馬克思把實踐的存在和社會的存在這些基本規定歸入人的本質規定之中。人的感性作為“對象性”活動，本質上是實踐的對象化，而作為實踐的對象化本質上是社會的對象化。可以看出，馬爾庫塞十分強調感性概念的社會實踐特徵⁵。

總的看，馬爾庫塞至少指明了以下幾點：第一，感性是異化的主要通路。因為感性與對象化、勞動、實踐不可分，感性的受動性、依賴性既可以成全人的自由，又可以剝奪人的自由，使人異化。因此，異化的消除與感性的解放有必然聯繫。第二，感性的需要以及情欲、本能決定著人的根本存在，是人生存的根本動力，而這些需要的滿足並非都是自由

⁴馬爾庫塞：《工業社會和新左派》，商務印書館 1982 年版，第 130 頁

⁵ 參見馬爾庫塞：《審美之維》，三聯書店 1989 年版，第 108 頁

和幸福，因為需要有真假之分。因此，本能和需要的解放也是感性解放的一個重要部分。第三，感性概念使馬克思完成了從德國古典哲學到革命理論的決定性轉變。把感性和實踐納入人的本質，使理性和幸福結合，實際上是形成了一種新的思想概念。因此，解放了的感性——新感性“意味著一種新型的人的誕生，這種人直至他的本性，直至他的精神都不同於階級社會的人的主體：‘社會的人的感覺不同於非社會的人的感覺’。‘感覺的解放’包含有改造社會時這些感覺成為‘實踐的’，包含有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物的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但是感覺也將成為新的（社會主義的）合理性的‘根源’：從剝削的合理性中解放出來。解放了的感覺將拒絕資本主義的工具主義的合理性，然而將維持和發展它的成就。”⁶

因此，新感性被看成是新社會、新人的原則標準，又被看成是從工具理性的壓迫、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前提。新感性可以破除虛假需要，喚起真正的需要；新感性可以消除本能中的攻擊性和破壞性，改變本能結構，使人的活動（勞動）“愛欲化”並與消遣性活動相融合；新感性可以成為重建科學和技術的基礎，它可以促使科學技術“藝術化”，消除技術的“中立性”和工具性特徵，使其審美化；新感性能夠把理智和幸福結合在一起，即把傳統定義的勞動與消遣融為一體。由此可以斷定：新感性作為一組新的人本主義原則，規範、指導著“社會主義新人”的物質精神生活，它不僅具有破壞舊世界的潛力，而且應“按美的規律塑造世界”之要求，執著於人的自然（人性）的解放。故，在實現由工具理性向歷史合理性過渡，去意識形態之蔽的理論活動中，新感性是一種不可低估的力量。

2·新理性(new rationality)

需要重新塑造的第二種新的批判與解放的因素是理性。在《單向度的人》最後一篇裏，馬爾庫塞論述了哲學的功能和歷史使命，並引申出建立新理性的必要性。他認為，通過論證普遍概念的妥當性來揭示哲學功能的確實性是一條好的路徑。哲學是主體與客體本質關係的普遍性認識，是指導具體實踐的普遍方法。因此，哲學所揭示的普遍性概念本性如何，直接決定哲學功能能否正常發揮。哲學概念的普遍性不是量的指稱，而是對整體的質的概括，是對存在於特定歷史條件中的同類事物之共性的把握。因此，哲學概念的普遍性就把一般與特殊、可能與現實、歷史與超歷史的統一看作是自己概念中的應有之義，並因此而獲得了立足經驗事實之上又高於經驗事實、指導經驗實踐的合法性根據。就是說，哲學的

⁶ 馬爾庫塞：《工業社會和新左派》，商務印書館 1982 年版，第 131 頁

普遍性概念既是歷史性的，又是超越歷史性的，因此它可以打破歷史條件的束縛，否定現存的現實，並通過自身的否定性，打破限制，追逐自由。哲學概念普遍性的這些作用就是哲學思維的作用，其合法性基礎就建立在普遍概念的辯證特徵上。

哲學發揮作用的途徑是通過哲學謀劃（project），哲學謀劃應該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哲學家在提出自己的謀劃時，擺脫不了時代的烙印，有著特殊的境域和特殊視野的限制；另一方面，哲學思維追求普遍性，意在透過歷史性視野所設置的謎障而把握共同領域的共同性，故，從特殊中提升出來的普遍性哲學謀劃必然能夠作用於特殊的社會實踐。當然，哲學謀劃的效果有無，還取決於更為複雜的其他因素。一般來說，符合以下標準的哲學謀劃才能完成積極有效指導具體社會實踐之使命：第一，哲學謀劃的超越性必須與社會發展的實際可能性一致；第二，預示推進文明發展的前景；第三，改造現存社會，賦予它新的結構、趨勢和關係；第四，在新制度下，為人的解放和自由提供更大的機會。

符合上述標準的哲學謀劃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超越性的合理謀劃。然而，這種謀劃要從理想落實為現實，還需要一個重要環節：它只有被社會成員變成自己的意識時，才能付諸實踐。實現這一步又需要一個前提條件：建立一種能夠取代單向度的技術理性，把科學、藝術、哲學中的積極因素集於一身的新理性。

新理性應該是一種歷史的合理性，其源頭是原來的辯證理性。新理性在黑格爾哲學中曾有輝煌表現，但黑格爾未完成哲學的否定，他的辯證理性仍有缺點。馬爾庫塞在馬克思的感性的幸福概念中，在祁克果、尼采的非理性主義的意志本體中，在佛洛德的生命本能中，找到了黑格爾的理性所缺乏的東西，他使理性與幸福、本能聯合起來，因此，新理性可以被稱為“感性的理性”，藝術化的技術理性，或“滿足的邏各斯”。考慮到與工具理性的區別，又可以把新理性叫做歷史合理性。那麼，新理性有些什麼樣的特質？馬爾庫塞的回答是：

——新理性是一種否定性思維。我們知道，馬爾庫塞一直傾向於把社會結構理解為歷史性結構，自然不過是歷史的一部分。他還接受了海德格爾的觀點，認為歷史性結構決定著現實的社會歷史現象。由於歷史性結構同時是辯證結構，因此，其本身就不斷地自我否定，把已確立的合理性的現實轉化為不合理，漸次實現歷史進步。相反，工具理性把社會、自然結構看成是一個中立性的、靜態的物質技術結構，人從屬於技術，從屬於這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所以，根源於辯證邏輯的新理性必然以否定性為自己的本質特徵而與工具理性

相區別。

——新理性堅持真理與理性的絕不可分。新理性就是真理和價值的統一，並且在終極意義上，真理便是價值。“和平”、“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發展”被認為是最終價值，並且“理性概念就源起於這一價值判斷，真理概念不能與理性的價值相分離。”⁷。新理性拒絕價值中立，它致力於恢復價值在理性中的重要位置，以實現引導人們組織社會、合理利用自然之目標。

——新理性並不拋棄技術。馬爾庫塞接受馬克思的觀點，認為向理想的合理社會過渡一定要依賴技術的高度進步。因此，改造技術的方向是新理性的一個重要內容。工具理性統治的科學技術，奉行價值中立原則，在促進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促進居民物質生活水準提高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它的負面效應也十分明顯：人在富裕的社會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感覺到普遍的壓抑，人變成經濟社會的簡單附屬物。人與人之間，表現出的是相互攻擊和殺戮，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表現為人對自然的瘋狂掠奪。在當代發達工業社會，人們匍伏於虛假需要腳下，根本不能實現“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發展”；人們因相互畏懼、仇視而無情攻擊，不可能實現“和平生存”。因此，對技術的改造是刻不容緩的。對技術的改造，在於使藝術理性同技術聯姻，達到技術的藝術化。馬爾庫塞認為，藝術不僅可以矯正技術之不足，而且藝術實現了感性與理性的結合，是人自由創造的基礎。所以，藝術追求的目標及其達到的效果是“寂靜”、和平，而不像工具理性那樣，是效率、競爭、攻擊。藝術還原可以成功地把控制和解放結合起來。當然，技術的藝術化並不是要用藝術去代替技術，而是要通過藝術消除技術單純的“匠氣”，釋放出技術的解放功能。藝術提供理想目標，“有效地交流對現存的東西的控訴和解放的目標設想”⁸。

——新理性既是一種理性又是一種本能。新理性與感性和幸福有著密切聯繫，是滿足的邏各斯。在《愛欲與文明》中，馬爾庫塞詳細地說明了這種新理性。他所謂的愛欲就是人的生命本能，它追求的是直接滿足、快樂、歡樂（消遣）、接受，沒有壓抑，遵循的是快樂原則。愛欲在本質上是對快樂的追求。這種快樂就是幸福。“幸福一詞所指的不僅是私人的、主觀的狀態。幸福不僅是一種滿足感，而且是一種實在的自足和滿足，幸福包含了知識，它是理性的動物的特權，”⁹可見，幸福是感性與理性的結合。壓抑性的文明對應於

⁷ 馬爾庫塞：《單向度人》，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8—199 頁

⁸ 馬爾庫塞：《工業社會和新左派》，商務印書館 1982 年版，第 144 頁

⁹ 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3 頁

操作原則統治下的工具理性，非壓抑性的文明則對應於一種新理性。“因此，本能的解放包含了理智的解放，而且由於反對思想和想像自由的鬥爭變成了集權主義的（不管是民主的還是權力主義的）有力工具，情形就更是如此。”¹⁰

——新理性是一種歷史的合理性。新的歷史合理性強調“自由對歷史必然性的侵入”，人可以進行“決定性選擇”，因為，“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不過是在一定條件下創造自己的歷史。”新的歷史合理性有兩大任務，一是“力圖確定已確定的合理性的日益明顯的不合理性特徵”，即進行理性批判，二是根據新的歷史合理性，把真正的潛能變成現實，即實現“和平生存”，建立一種非壓抑性的文明。

綜上所述，新理性與新感性一樣，體現為一種追求自由的解放力量；新理性將科學理性與藝術理性統一起來，將理性的功能理解為促進生活的藝術。由於藝術中蘊含著一種否定因素，藝術理性是一種專事破壞現存事物的理性，因而，它必定能破除意識形態的虛假、欺騙本性，並由此實現對單向度意識形態即不加批判地認同現存秩序的觀念體系的超越。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理性只要為社會成員普遍接受，就必將能引起解放的大變動。

3· 追問技術的目的

馬爾庫塞從現實和文明史兩個角度分析了科學所造成的惡果——壓抑、異化，並由此引發出他對技術目的的回答：和平生存。他指出，和平生存的出路在於藝術和技術的結合，理性與感性、幸福和本能的聯姻。

從現實的技術世界來看，馬爾庫塞指出，現代科學技術已成為意識形態，它導致了政治領域的封閉，不幸意識的征服，話語領域的封閉和單向度的思想，它是一種控制人、自然及社會的主要手段，在其統治之下，人處於壓抑、異化、痛苦之中。技術一方面造成物質生活的豐富，另一方面則是攻擊、壓抑和破壞。單面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徵便是其攻擊性，而這種攻擊性主要地便是技術管理延伸到本能，使本能結構發生變化而造成的。

社會對攻擊性的操縱是本能控制的典型形式，其途徑是把攻擊行為轉給技術工具以減輕負罪感。“工藝的攻擊和滿足”，這就是新控制形式與傳統控制形式根本性區別所在。工藝攻擊使心理動力學發揮作用，這種動力學增強清教徒式的心理狀態的破壞傾向和反性本能傾向。並且，主宰一切的技術機器和政治機器吸收了人的有罪感和責任心，從而削弱了能夠阻止和昇華攻擊本能的其他價值。這樣，攻擊就可以無阻攔地進入生活本能的領域，

¹⁰ 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1961 標準版序言，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 頁

使大自然也越來越屈從商業組織。於是，馬爾庫塞發出這樣的疑問：技術的目的是破壞和攻擊嗎，是統治和壓抑嗎？是加劇人們之間的生存鬥爭嗎？

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技術的價值中立問題，技術現有的目的性傾向——維護統治——也是十分成問題的。在《愛欲與文明》中，馬爾庫塞指出，迄今為止的文明都是壓抑性的。

“在人類文明史上，基本壓抑¹¹與額外壓抑交織在一起。不過，在前工業文明階段，由於生產力水準低下，物質生活資料匱乏，對人的壓抑多是為保證人類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壓抑；而在工業文明階段，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物質生活資料極為豐富，對人的壓抑則是為維護統治秩序所強加的額外壓抑。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轉變，前工業文明過渡到工業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說，工業文明是人類歷史進步。但是，西方工業文明作為壓抑性文明，是通過異化而進步的。西方文明，從柏拉圖以來一直以理性主義為中心，認為理性是人的本質，而理性從功能上來說是壓抑性的。即為了滿足主體人的需要，就得不斷地征服自然；而為了理性的進步，就必須壓抑人的非理性本能。這樣，文明每前進一步，壓抑就強化一步；發達工業文明是壓抑性文明發展的頂峰。在這裏，人對自然的支配、人對人的統治，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效率上，都在日益加強。”¹² “人對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殘恰恰發生在文明之巔，恰恰發生在人類的物質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時刻。”¹³

在此意義上，馬爾庫塞談到了“文明的辯證法”：正是文明的進步導致了日益增長的破壞力量的釋放。文明的進步伴隨著負罪感的增強和幸福的喪失。當技術上升為文明的替代物時，文明的辯證法也就成了技術的辯證法：文明的進步=技術的進步=物質財富的增長=奴役的加強。在這種辯證法鞏固下，一片烏雲籠罩著發達工業社會：技術吞噬了個體，所有的統治都採取了管理的形式使攻擊和負罪感內投於心，個人的罪惡轉化成社會制度的罪惡，技術時代成了罪惡的淵藪，勞動完全異化。裝配線的整套技巧、政府機關的日常事務及買賣儀式，都已與人的潛能完全無關。整體壓抑產生了奇異的功效，它擴大了物質文化的範圍，加速了獲得生活必需品的過程，降低了安逸和豪華生活的代價，擴大了工業生產的領域，但在同時，卻又在維護著苦役和行使著破壞。個體由此付出的代價是，“犧牲了

¹¹ 依照馬爾庫塞的解釋，所謂基本壓抑（basic repression），就是為使人類生存、建立文明而不得不對本能進行的必要壓抑。

¹² 王風才：《馬爾庫塞非壓抑性文明論研究》，載《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3期。

¹³ 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導言，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頁。

他的時間、意識和願望；而文明付出的代價則是，犧牲了它向大家許諾的自由、正義和平”¹⁴。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景觀啊！難道技術的目的就是攻擊和統治嗎？

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馬爾庫塞指出，技術的目的不是攻擊，破壞、壓抑、異化，而是實現新理性的目標，那就是“和平生存”。“平息生存鬥爭”，這是技術的“終極因”。這意味著否棄科學技術的價值中立，以新理性來規定科學技術的新方向。由於已確立的技術已變成破壞性的政治工具，因此，技術轉變同時就是政治的轉變。但政治變化只是到了將改變技術進步方向即發展一種新技術時，才會轉化為社會的質的變化。如果技術是為平息生存鬥爭而設計和利用，這樣的質變就會是向文明的更高階段的過渡。技術進步的這種新方向將是既定方向的突變，即不僅是流行科技合理性的量的漸進，而且是流行合理性的突變，是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新觀念的實現，這種新文明意味著把價值準則變成需要，把終極因變成技術可能性，這是征服社會和自然中的尚未被駕馭的壓迫力量的一個新階段。在有步驟地將自己規定為政治事業的過程中，科學和技術將超越它們曾因中立而從屬於政治的那個階段，並反對它們作為政治工具的專門功用。因為，對終極因的技術再規定和技術控制，是擺脫了妨礙滿足人的需要並發展人的才能的特殊利益之後對資源的建設開發和利用。因此，技術可以對理性和自由的不成熟狀況提供歷史的矯正，據此人在以壓迫為基礎的自我持續的生產能力的進步中，成為自由的並保持著自由。

馬爾庫塞還進一步指出了“和平生存”實現的可能性及途徑。他認為，對技術的藝術改造，即是解放，這種解放，就是為技術設定理想的目標，這目標的特徵就是審美的非功利性、非攻擊性以及和平和“寂靜”的理想。藝術化的技術實踐可以把目標變為現實，使控制由壓迫變為解放，其將來圖景便是非壓抑性的文明，或是幸福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世界圖景。用藝術、感性來消除技術的功利性、攻擊性及剝削特徵是馬爾庫塞後期解放思想的主要傾向，這也決定了他後期著作主要是美學著作。藝術上完成的解放總是與烏托邦聯繫在一起。在浪漫中懷舊，在懷舊中幻想，在幻想中探尋，“政治詩學”成就的只能是空中的五彩雲朵，這便是它從誕生起就註定了的宿命。

¹⁴ [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1 頁。

烏托邦棲息地

馬爾庫塞的“政治詩學”思想已失去了傳統政治學意義上的革命理論的基本特徵。它將由社會、經濟問題引起的政治革命轉移到了文化問題與文明問題等領域。它沒有鼓動階級對決的政治綱領。它反對一切現存秩序，但又只是提出美學意義的變革原則，要求觸動的不是實存物，而是人的主觀態度。因此，它是一次爲了當下的革命，它不呼喚將來，它也就無須犧牲和殉難。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有強烈懷舊心態的浪漫主義者的反現代性的革命。這個革命要完成一個方案，一個按照浪漫主義者的詩情畫意謀劃的現代性拯救方案。馬爾庫塞要把技術理性時代的異化現象——理性本來是對人的意義與價值的總體構想與設計，現在卻淪落爲被技術盲目操縱的工具和手段——割除乾淨，將人類文明中一切壓抑人性的因素全部清理出去，進而把處於現代性困境中的人類帶入一個真善美統一的自由王國。這個王國是一個人的本能欲望、精神自主力、創造才能得到完全解放的社會，一個由“愛洛斯”（Eros，愛欲）占統治地位的消除了任何壓抑的、能滿足人的“感官的、倫理的和合理的需要”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勞動分工和商品生產將成爲歷史陳跡，消滅的不僅是物質匱乏還有精神匱乏，技術控制和奴役別人的人統統遭遇放逐，而異化和壓抑則成爲只存在於歷史辭典中的字眼，幸福生活也不再以環境污染爲代價，道德的、美學的需要真正成爲人的基本需要。這個理想是馬爾庫塞頭腦中的詩性想像，是觀念形態的東西而不是現實的東西，要把這一理想變爲活生生的現實，需要人的社會實踐，需要把這種社會實踐付諸行動的歷史主體。就像無產階級是馬克思革命理論之實踐著的歷史主體，誰能成爲馬爾庫塞藝術革命理論實踐著的歷史主體呢？馬爾庫塞無言以對。

馬爾庫塞對現存社會的分析實際上已經把自己置於了一個絕望的境地：在技術生產體系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能力與人類不能批判地思考自己處於富裕中被支配與奴役的現象之間，存在著令人驚異的同一性。也就是說，技術進步已擴展到社會的整個控制和協調系統之中，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或權力形式，它調和著種種反對此系統的力量，挫敗或拒絕以自由的歷史性前景的名義對奴役和統治進行的所有反抗，甚至思維屈從於現實也到了不再對社會生活提出任何批判的地步。發達工業社會終結了歷史，關閉了社會解放的所有可能性。

然而，批判理論的頑強就這樣有了表現的機會。正因爲我們沒有希望，希望才給予了

我們。正因為現存的歷史已經終結，非歷史性思維才有了用武之地。既然不能在歷史的現實維度上尋找到解放的可能，走入幻想也許可以提供另外一種可能的解放方式。也就是說，透過表達在藝術中的幻想，我們所希冀的烏托邦理想，終於能夠成為我們生存的真理。在“集權主義國家觀中反對自由主義的鬥爭”（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tion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一文中，馬爾庫賽說：

一種社會理論，如果它所主張的實踐是受自主理性（autonomous reason）、即受人類所具有的通過概念思維來領會真、善、正義的功能所支配的，那麼這種社會理論就是理性主義的（rationalist）。在社會中，每一個行動，每一個目標的決定，以及社會總體組織的確立，都必須在理性的決定性判決面前證明自己的正當性；任何事物，為了能夠作為一個事實或目標而存在下去，都需要理性的辯護（rational justification）。¹⁵

注

¹⁵ Marcuse, *Negatio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 14.